



在希望的田野上 | 行进中的“三农”故事 |

FENJIN ZHONG DE
XIN NONGMIN

范迪军
张正河 编著
刘闯

奋进中的 新农民

禁
外
借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在希望的田野上 | 行进中的“三农”故事 |

ZAI XIWANG DE TIANYE SHANG XINGJIN ZHONG DE SANNONG GUSHI



FENJIN ZHONG DE XIN NONGMIN

奋进中的 新农民

范迪军
张正河 编著
刘闯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 山 书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希望的田野上——行进中的“三农”故事：奋进中的新农民/范迪军,张正河,刘闯编著.—合肥：黄山书社,2018.2

ISBN 978-7-5461-7396-2

I .①在… II .①范… ②张… ③刘… III .①三农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0656 号

在希望的田野上

——行进中的“三农”故事：奋进中的新农民

范迪军 张正河 刘 闯 编著

出 品 人 王晓光

特 约 编辑 王舒彦

责 任 编辑 李玲玲 秦矿玲

责 任 印 制 戚 帅 李 磊

装 帧 设计 钱志刚

出 版 发 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 山 书 社 (<http://www.hspress.cn>)

地 址 邮 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 刷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80 000

印 张 15

书 号 ISBN 978-7-5461-7396-2

定 价 60.00 元

服 务 热 线 0551-63533706

销 售 热 线 0551-63533761

官 方 直 营 书 店 (<https://hsss.tmall.com>)

版 权 所 有 侵 权 必 究

凡 本 社 图 书 出 现 印 装 质 量 问 题 ,
请 与 印 制 科 联 系 。

联 系 电 话 0551-63533725

谨以此书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

序

这是一套讲述中国“三农”转型的系列故事书。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是从农村拉开的。回眸四十年中国，特别是四十年农村的变化，你会有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感触。这些变化的背后有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文化、制度的影响，值得我们去挖掘。而范迪军、张正河教授，却是以故事的笔触，讲述这四十年的变迁，读后感到真实、生动，很接地气，是一本不多见的，比较完整的“三农”故事书、历史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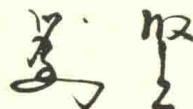
四十年来，我们颁布实行了许多方针政策，无论是家庭承包经营制，还是后来的税费改革，以及正在推进的农村多种经营主体、承包地“三权”分置、城镇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追溯起来，无不都是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创造和摸索，然后再总结、完善，上升为理论和国家政策。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这套故事书里，你都会找到那些理论和政策的源泉。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套书里，讲述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故事和人物，既反映了他们对理论创新的探索，也体现了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成果。读完这些故事，你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以及对党的十九大精神，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中国的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由解决总量不足转入了一个重质量的发展新阶段。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发展方式，正转入适度规模经营，并新生出许多新的经营主体。从农民来看，一方面，现在许多农民进入了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成为新市民；另一方面，又催生出许多训练有素的新型职业农民。中国的农

村，已经由原来的城乡差距较大，转变为城乡融合发展、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就是中国“三农”所面临着的许多新变化。这里没有现成的发展模式去抄袭，没有现成的捷径可以一蹴而就。中国“三农”的未来，需要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去继续探索和不断实践。我相信，在今后的实践中，必将涌现出许多新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我也期待着范迪军、张正河教授再出新的“三农”故事集。

中国“三农”在希望的田野上，将会永远充满生机！



(农业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

2018年1月15日

目 录

粮农篇 国家发展的战略基础

- 第一节 公社农民 /004
- 第二节 家庭承包户 /012
- 第三节 新型经营主体 /018

专业户篇 干一行专一行，致富的良方

- 第一节 蔬菜专业户 /031
- 第二节 养殖专业户 /038
- 第三节 花卉种植专业户 /043
- 第四节 运输流通专业户 /048

农民企业家篇 田野里走出的致富精英

- 第一节 个体户 /055
- 第二节 乡镇企业家 /059
- 第三节 电商老板 /065
- 第四节 乡村旅游开发者 /071

农民工篇 国家经济建设的一线主力军

- 第一节 建筑工 /080
- 第二节 工厂蓝领 /085
- 第三节 工厂白领 /090
- 第四节 服务业工人 /094

文化农民篇 修养自身，福泽乡里

- 第一节 乡村教师 /103
- 第二节 乡村医生 /108
- 第三节 乡村文化艺人 /113
- 第四节 当代乡贤 /118

村干部篇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第一节 基层干部 /129
- 第二节 大学生村官 /138
- 第三节 驻村干部 /143

新型农民篇 做新时代农民的担当者

- 第一节 职业农民 /155
- 第二节 创业农民 /162
- 第三节 “休闲养老”农民 /171

越洋农民篇 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

- 第一节 越洋务农者 /181
- 第二节 跨国商人 /189
- 第三节 越洋打工者 /198

特殊农民篇 奋进出英雄，榜样成力量

- 第一节 旗帜农民 /211
- 第二节 改革功臣 /218
- 第三节 励志农民 /223
- 第四节 荣誉农民 /229

粮农篇

国家发展的战略基础





导 读

农业是国之根本，粮食是农业之根本。粮食生产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是人民生存的根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基础。提高粮食自给率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

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要采取措施稳定粮食生产，特别是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粮食安全战略”之后，稳定粮食生产的举措进一步完善。截至2017年，国家已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强化对粮食主产省和主产县的政策倾斜，保障产粮大省、大县重农抓粮得实惠，有发展；粮食主销区要切实承担起自身的粮食生产责任；全面开展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统筹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将口粮生产能力落实到田块地头，保障措施落实到具体项目。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整个人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把粮食安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没有战略安全可言，只能任人卡脖子，被人牵着鼻子走。

在保证粮食安全上，处于粮食生产一线的农民功不可没。这些农民即通常所说的“粮农”，他们从事粮食作物种植、田间管理、作物收获等一线工作的群体。粮农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好几千年。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场景在古代诗词里展现得淋漓尽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写出了中国古代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状态。“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体现了劳作成果来之不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道出了农民按时令劳作。“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



中国古代农村男耕女织的场景

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描绘了一家人各司其职的生活场景。

几千年以来，朝代更替，小农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依旧如此。随着新中国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小农的生存状态彻底被改变了。之后，土地、财产均归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之间又联合成一个乡镇级公社，正式名称为“人民公社”，散漫、随意、根据时令而劳作的农民成为了分工明确的公社社员，大家集体参加生产劳动，并按照各人所获劳动工分获得劳动报酬。

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土地制度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联产承包户普遍出现，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村和农民的活力。

这个阶段也是中国向农业现代化、机械化过渡的关键时期。随着工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从被束缚的土地中解放出来，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去沿海发达地区寻找发展机会。“农民工”成为这个时代家喻户晓的



称呼，他们农忙时回家务农，农闲时外出打工。有些农民离家越来越远，家庭内部出现分工，“男工女耕”；或者夫妻二人一起外出，父母在家务农。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以及外出务工越来越普遍，有些农民则在家将其他农户的闲置田地流转到自己手中，以便扩大种植规模。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国家粮食种植补贴政策的出台，传统粮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从个体家庭种植走向以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多种经营主体形式的转变，粮食生产无论是单产还是总量都保持稳步增长的势头。

第一节 公社农民

毛主席曾说过，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支持，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也离不开合作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及农民的发展走的是逐步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从1950年到1952年年底，中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得中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从1953年开始，中国按照“三步走”的计划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按照农民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几户或十几户的初级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组织农民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成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到1956年年底，中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8年中国开始走向更高级的合作，共建立农村人民公社26576个，入社农户1269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9.1%，建立公共食堂265万多个、托儿所和幼儿园475万多个、老人幸福院10万多个，组建民兵师1052个、民兵团24525个，有基干民兵4905.7万人，普遍建立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人民公社。

一、农民——从单干全包到集体分工的转变

中国农村普遍形成了“公社一大队一生产队”的管理模式，一个村就是一个大生产单位，称为“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再按照人口、居住区域等划分为几个或十几个生产小队。生产小队是最小的生产单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即使是最小的生产队，也配备了整齐的班子，有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员、妇女队长、民兵排长等，有些大的生产队还配备了副队长。那时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生产队长是安排活的，副队长是领着干活的。”

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建立了饲养屋、仓库、场院、猪圈等。而且饲养屋、场院是生产队里最热闹的地方，粮食都是从这里分到各家各户，信息都是从这里进进出出，孩子们也喜欢在这里玩耍、嬉闹。

生产队出工都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在每个生产队社员居住相对集中的地方，大都在高高的杆子或竖立的石柱上悬挂着铃铛，上工早晚，全凭铃声为号。这个时间早晚一般由生产队长来把握，由各生产队长来打铃。每天早晨、上午、下午，生产队长都会先到这里打铃，社员听到铃声，就迅速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生产队长扯起嗓子喊道：“青壮年跟着副队长去送粪，妇女跟着妇女队长干，四个老头跟着我去耕地……”

队长分工后，各个生产队里的社员分布在村子辽阔的田野里，一队队推车送粪的，身后响起了一阵阵小推车“吱吱扭扭”的美妙响声；一个个赶牛耕田的，分布在田地的各个角落，发出吆喝牛的“啊啊、哩哩、啦啦”声，鞭打牛的“叭叭、叭叭”声，此起彼伏。

以上是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千万个农村生产队劳作场景的缩影，人民公社制度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产行为方式，进行类似“工厂式”的分工劳作，也改变了分配方式，按工计酬，按劳分配。

当时农村实行工分制，每个社员每天按照生产队长分派的活，干完了活，到了晚上，记工员按出工时间或按劳动量给每个劳动力一一记工分，最后逐月累计，交由生产队会计核算，家家户户便可按所得的工分分粮、分钱。同一生产队里的社员工分不一样，而且不固定，他们以集体评议的方式决定每人每天应得多少工分，评议的依据主要是看每人在劳动中的长期表现和实际



江苏省启东县工分票

劳动量，其次看性别、年龄、劳动能力等方面，最后生产队长全面评定每个社员的工分。

“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工分对每一个家庭、社员来说都十分重要，它直接涉及一个家庭的生活状况，因为每个家庭都要靠在生产队挣的工分养家糊口。工分评定好了，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评定得不好，容易使社员出工不出力。

另外，分配时需要用“牛尾巴秤”称量，收缴公粮、剥花生种也需要用“牛尾巴秤”称量。社员平时的消费主要凭票进行，吃饭需要粮票，吃油需要油票，穿衣买布需要布票。

二、干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70年之前，我父亲干过10年多副队长，1970年春天开始担任队长。生产队副队长的主要职责是专门带领社员干活。因为要敲钟，所以他比其他社员和干部起得早；因为担责任，又比其他社员收工晚。报酬就是阴天下雨不扣分，能拿一个劳力的满工分。我父亲热心肠，喜欢为人家办事，社

员都很敬重他。

其实，我家祖父辈是从外地逃荒要饭到这个村上来的，父亲没有兄妹，属于村里名副其实的“孤门独户”。

有一年春天评工分时，原来的生产队长给他老婆多定了半分。妇女属半个劳力，每个工日平均7分，最棒的女社员才能拿到8分，当然也有一部分受到照顾，比如女知青就可以拿到8分。队长老婆身材瘦小，干活一般，结果给她定7分半。因此，社员都说队长有私心，一下子告到公社。公社派人前来调查，发现社员反映的情况属实，而且还查出队长利用请木匠做农具的机会，在家里管饭时用的米面超标。公社把队长停了职，我父亲原先是副队长，大伙都喜欢他，拥护他，最后推举他当队长。

父亲当生产队长之前，我已经一年多没回生产队干农活。在父亲当上生产队长的那一年，我又开始参加生产队劳动。麦收前夕，生产队“排镰刀”（就是排能拿镰刀割麦子的人），把我也排上了。当时我们医务室共3个人，来自3个生产队，结果就我一人回了生产队。我很生气，父亲却对我说：“麦收是老少弯腰的季节，我是队长，只有排上你，我才好大胆说别人。”

父亲当上队长后，比过去更忙，家里的事一点也插不上手。我们家住



生产队长带领社员耕地



在山坡上，下山的路很陡，吃水、运东西很不方便。特别是往自留地里送粪，更不是妇女、小孩能干的活儿。那时候运输工具都是用平板车，我们兄妹力气弱不能拉。母亲前几年就是因为从高坡朝下拉粪平板车翻了砸断腿，打着“膏布”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父亲没时间，只好和其他男社员换工。别人替我家拉粪，我父亲把自己挣的工分按换工时间算给他。那个换工的社员一开始坚持不要工分，但父亲就是不答应。我父亲 10 多年前已经作古，这个换工的社员今年才 60 多岁，他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以上是一个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长的儿子对父亲的回忆。生产队长是件苦差事，每一个生产队长就是百多号人的当家人，他要懂得一年四季的生产安排，还要接受上级下达的生产指标。他首先要是种田的好把式，样样拿得起，出工最早，收工最迟，还要没有私心，不能贪生产队的一点便宜，所以当生产队长不但没有额外的收益，而且要付出更多。但能当上生产队长的往往有着说一不二的脾性，在本队有着非常高的威望，是大伙信得过的人，因为他们是生产一线的主要带头人，粮食增产和管理都离不开他们。

生产队长是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干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他干部中，公社一级属于国家下派机构，他们主要是掌握政策导向，比如结婚登记、参军入伍、土地种植计划下发、大队干部管理、水利建设派工、治安管理等。生产大队有党支部、大队长、民兵连、会计、赤脚医生、俱乐部、民办老师、大队植保员、水利员等，但这些人员在没有工作时也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在所在的生产队参与分配。他们大部分的工作是与老百姓打交道，生活在群众中，带领群众一心一意搞建设。

三、知青——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8 年深冬时节，正是全社会落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伟大指示的高潮时期。12 月底的一天，李新生告别河南省郑州市第二十三中学，和他正上高一的二姐一起，随着省会知青下乡大潮，踏上了落户农村的道路。

早上 6 点多，天很冷，他哈着气、缩着脖子、背着铺盖卷，在郑州市十一中门口集合。不一会儿，市里安排的公交车到了。临上车时，他忽然听

到学校广播里传出他和二姐的名字，是表扬他们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

他们的父母都是老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省委工作，坚决支持他们下乡，告诉他们向农民学习有好处，不可享受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们“根正苗红”，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服从父母的意愿，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破旧的公交车载着李新生姐弟俩走了一天，天黑时到了唐河县。所有知青被安排在县城最好的招待所，可他们还是睡不着。因为房间四处透风，太冷了，他们想烤烤火，却连干柴都找不到。第二天清晨，唐河县郭滩公社几位干部来迎接他们。还没进村，他们就听见锣鼓喧天，路边挂着“热烈欢迎郑州知青插队”的条幅。当天上午，公社礼堂举行大会，知青代表登台讲话表决心。会后，他们被分到了该公社的尚庙大队。

李新生和他二姐以及两名19岁的女知青被分在第四生产队。因为住房紧张，李新生等人先在妇女主任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来，生产队提供一间会计室给李新生住，他二姐和另外两个女知青住进了队里的仓库。

艰苦的农村生活，让17岁的李新生从一名文弱书生一下子变成了肩负重担的男子汉。半年过后，烧锅做饭，劈柴打水，深翻耕地，撒粪扬场，他样样都会，一招一式都与当地农民一样，完全没有了高干子弟的影子。

李新生在农村干的最重的活是脱坯烧窑。1969年夏，生产队烧砖搞副业，他每天和泥、脱砖坯。那泥必须和得跟面一样细，不能有任何杂质，不然烧出的砖不结实。脱坯最累，开始他一次只能脱两个，后来增加到4个。一天下来，整个人都虚脱了。

李新生姐弟俩在唐河农村待了一年多，1970年春节过后，他们依照有关政策，随父母迁到长葛县八七公社（现为长葛市和尚桥镇），开始了新的插队生活。那段经历，是所有插队知青的生活缩影。到现在，他还保留着那时的作息习惯，早上6点起床，听广播，看新闻，先干一阵活儿再吃早饭。

像李新生姐弟俩这样的人，在中国有个专门的称呼——知青。从1950年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他们是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或兵团务农及开发、保卫边疆的年轻人，实际上这些人中大多数只有初中或